

文景

Literary

Landscape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书店出版社

3 / 03

茨维塔耶娃， 大地的女人

西方女权主义的后现代走向
在妻子与情人之间
达洛维夫人
边缘人阿伦特

ZWTS



正月初八早上，在同仁们互道春节好的祝福声中我走进了办公室，最先看到的是收发室送来的一份来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印刷品，我马上知道这是我订购的《文景》到了。

本来我想打扫一下卫生再干正事，可是《文景》的封面人物库哈斯吸引了我，因为我本人是工程师，对库哈斯稍有所知，于是接着下去，竟一口气读到中午。用一位建筑师作封面，把有关他的文章排在头版，这在我看到的同类杂志中还是第一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景》选题面宽，知识面广，不追求市场炒作的时尚，具有一定的艺术氛围，文化气息浓厚，是读书人喜欢的书，我将一直订阅下去。

哈尔滨中宇公司 李亚凡

2003年2月8日

在书店看到改版后的《文景》，令人耳目一新。关注《文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前以为只有在北京才能找到文化类刊物，上海的刊物，毕竟是海派的，但看到《文景》之后，这种想法即有所改变。从《文景》中，可以看出其致力于文化事业并潜心耕耘的不懈努力，改版之前的《文景》内容文质彬彬，但未免学究气太浓；此次新样靛装，不但形式活泼，落落大方，而且文章亦是言之有物，包容诸多丰富的元素，共同组合成一派现代的文化景观，更是突破了狭隘的海派文化的框框，想必贵刊用心良苦，实为读者之幸。

不过，还希望《文景》能够多以独特的视角关注文化，不必过多营造廉价的怀念与自恋的氛围，亦无需像时下许多刊物那样炒作哗众取宠的话题。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期待，作为一名读者，惟盼《文景》愈办愈好，蒸蒸日上。

清华国际联合汉语培训中心 刘瑞

2003年2月28日

2003年第1期《文景》，我已仔细阅读。

翻译家陈众议先生的《重心：回归的喜悦》，特别让人感兴趣。文学与童年的话题，已属老生常谈，并不新鲜。但陈先生将中西经典并排解读的方法却别开生面，诸如从《红楼梦》中刘姥姥对“钟”的“第一感觉”谈到《百年孤独》中父子俩“水”的“第一感觉”。陈先生没有做那些拙劣的中西比较，也没有给这些作品插上那些大而空当的理论羽毛。恰恰相反，在他的眼中，似乎国别并不重要，对作品的“第一感觉”才是关键因素。几乎每一个阅读者，都经历过童年时代那种对印刷品的如痴如醉，可惜它早已随着时间一去而不复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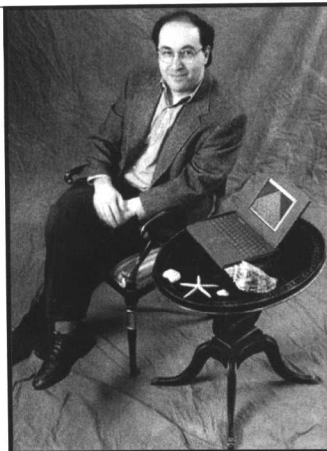
另外，万俊人先生的《罗尔斯与其正义思想》也很及时。去年，四位大师级的思想家遽归道山，在欧美乃至台港学界都引起不小的震动。但大陆学界反应相对比较平淡，不知是波澜不惊，还是未能意识到哲人们的力量。当然，罗尔斯的著作，这两年已译不少。所以，我更期待着看到有关诺齐克的文章。

有点遗憾的是，“手记”栏目本来应该是一块自由书写的空间，更少受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但本期的几篇文章，不管名家新秀，均有隔靴搔痒之嫌。

以上均属个人之见，见笑

上海师范大学 晓渔

2003年3月5日



虽然作出类似声称的人往往会被视为“民间科学家”或“伪科学”，“反科学”狂人，但是《新科学》的作者斯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却绝非泛泛之辈。P29

在诠释悲剧的时候，哲人的洞察比法律人的透视显示了更强大的说服力。这或许是因为哲学与悲剧在本质上是同源的，而法律人必须对悲剧抱有一定程度的冷漠才能具备足够的练达。P37

茨维塔耶娃，大地的女人

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介他的同时代诗人玛·伊·茨维塔耶娃：“（她）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对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则可以换一种说法：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爱伦堡的这番概括是恰如其分的，她似乎是为诗歌而生的，除诗歌写作以外，她的经历也充满了很多诗意的细节：浪漫中楔入了坎坷，温柔中酝酿着风暴，忠贞下蕴含了背叛；然而，她最终却以极其常见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死：自缢。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封面绘图：刘文章

封面 Cover

- | | |
|------------------|-----|
| 4 茨维塔耶娃，大地的女人 | 汪剑钊 |
| 10 在女诗人的“帕尔纳斯山”上 | 万海松 |
| 16 理解茨维塔耶娃 | 树才 |

关注 Fo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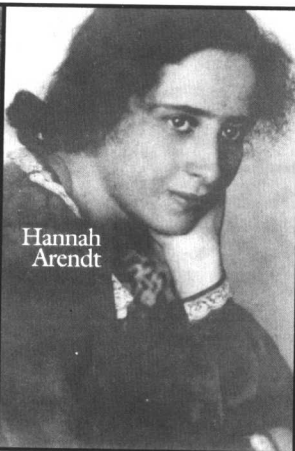
- | | |
|-----------------|---------|
| 17 西方女权主义的后现代走向 | 王治河 曲跃厚 |
| 24 美伊关系的前世今生 | 王健 |

阅读 Reading

- | | |
|--------------------|--------|
| 29 宇宙就是一台电脑吗？ | 钮卫星 |
| 37 布鲁姆和波斯纳对莎剧的解读 | 伊尔翰 |
| 41 在妻子与情人之间 | 吴炫 |
| 45 笔生花
——在盛放的年代 | 苏七七 |
| 50 安然沉沦三部曲 | 沈桂龙 于蕾 |
| 54 大道醇儒 | 钱钢 |
| 58 属于香港的传奇 | 王德威 |
| 61 都是罗马人 | 徐晓旭 |

艺术 Arts

- | | |
|----------------------|----|
| 64 达洛维夫人
——看碟读书之二 | 止庵 |
| 68 心灵奇异的歌吟 | 刘苇 |



“鱼从烂起”，罗伯特·布赖斯道出了安然垮台的实质。安然文化就是这样从安然的高层慢慢往下渗透，直至其毁灭。P50

近一二十年以来人们对阿伦特的兴趣正在持续而稳步上升，阿伦特是二十世纪最有原创性、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以致有人认为她已不再边缘。P73

剪影 *Portrait*

- 73 边缘人阿伦特
80 写在哲学边上
——德里达与解构

张汝伦
于奇智

书斋中来 *From the study*

- 84 读周作人散记
90 《七发》与广陵潮
92 述三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杂谈之二

孙郁
朱志洎
耿辛

手记 *Note*

- 97 前沿和后方
——顶层独白
99 像罗文中尉那样敬业?

吴亮
苟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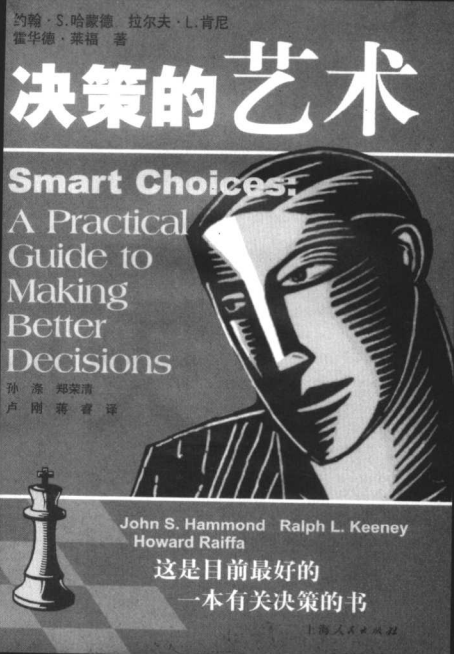
视野 *Preview*

- 101 塔希提之旅

72 书影絮语
105 书林印象
107 异国书情
109 刊海掠影

海岸

完颜
苏苏
Cello
乔治



《决策的艺术》

约翰·S.哈蒙德 拉尔夫·L.肯尼
霍华德·莱福 著
孙涤 郑荣清 卢刚 蒋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3版

这是目前
最好的一本有关决策
的书



约翰·S.哈蒙德 一位国际知名的决策咨询专家，擅长领域为商务谈判和企业战略。曾担任哈佛商学院教授。



拉尔夫·L.肯尼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知名决策顾问。



约翰·S.霍华德·莱福 一位决策理论和谈判分析领域的先驱者，哈佛商学院教授，著有《谈判的艺术和科学》一书。曾向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学以及医学专业的学生广泛传授决策知识。

茨维塔耶娃， 大地的女人

茨维塔耶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既是她的遗憾，
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
由此可以见出这位女诗人在二十世纪
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 汪剑钊



我的诗行是日记，
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
——茨维塔耶娃

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介他的同时代诗人玛·伊·茨维塔耶娃：“（她）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对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则可以换一种说法：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爱伦堡的这番概括是恰如其分的，她似乎是为诗歌而生的，除诗歌写作以外，她的经历也充满了很多诗意的细节：浪漫中楔入了坎坷，温柔中酝酿着风暴，忠贞下蕴含了背叛；然而，她最终却以极其常见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死：自缢。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1

茨维塔耶娃于1892年10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伊·弗·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之一。母亲玛·亚·梅伊恩有德国和波兰血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除音乐熏陶以外，母亲还给孩子们讲故事，诵读诗歌，教导她们不要在乎物质的贫困，而要崇拜神圣的美。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茨维塔耶娃逐渐滋长了对诗歌的信念：“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正是在“音乐和博物馆”中，茨维塔耶娃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生活。

1906年秋天进入女子寄宿学校以后，茨维塔耶娃开始深入地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重温童年时妈妈灌输到耳朵里的韵律和节奏，接触到歌德、海涅和其他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灵魂深处滋生了终生不衰的浪漫精神。像许多同龄少女一样，这个阶段的茨维塔耶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满怀对现实生活的叛逆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据说，她爱上了一位大学生尼伦德尔，为他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而对方表现出的冷漠使其痛不欲生。于是，她买了一把手枪，到一家曾经上演过她心爱的法国作家罗斯丹的戏剧《雏鹰》的剧院自杀，幸亏枪内装上的是一颗哑弹，才没有酿成悲剧，但由此也可见出诗人孤傲、刚烈、极端的性

格。

根据茨维塔耶娃的自述，她六岁时便开始诗歌练习，此后一直没有中断。1910年，这位18岁的少女自费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它引起了不少文学前辈的关注，其中有勃柳索夫、古米廖夫、沃洛申等。勃柳索夫从中看到了象征主义的遗风，古米廖夫则为其中所流露出的日常性关注而欣喜，因为它们恰好吻合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原则——让玫瑰自己来叙述玫瑰；至于沃洛申，除了对这部“年轻而幼稚的书”加以鼓励外，还亲自拜访了诗集的作者，这一举动成了他们真挚友谊的开始。在这部诗集中，茨维塔耶娃几乎是无意识地实践着她后来所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地球上人的惟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她把生命当成寻找真理的启示，而将写作认做通向真理的道路，在《祈祷》一诗中，她如是写道：

“基督和上帝！我渴盼着奇迹，

如今，现在，一如既往！

啊，请让我即刻就去死，

整个生命只是我的一本书。

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

我的灵魂呀，瞬息万变

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

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

全诗虽说还留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痕迹，但也透露了她一生所关注的主题：生命，死亡，爱情，友谊，艺术，自然，上帝。

1912年1月，茨维塔耶娃嫁给了一名民粹派分子的后代——谢尔盖·艾伏隆，并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神奇的路灯》题献给他。但是，这本诗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好评，阿克梅诗人、“诗人车间”的成员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作出了不太友好的评价，而她素来敬重的勃柳索夫也流露了明显的失望情绪。对此，茨维塔耶娃的反应是：“我如果是车间的成员，他们就不会如此辱骂了，可我永远也不会加入车间”。她认为，诗人应该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束缚的。果然，她不仅一直没有成为阿克梅

派的成员，甚至独立于所有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外，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保持着恰切的距离，尽管她与这些流派中的许多人都有私交来往。这种游离状态自然给她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便，但对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却大有裨益。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

2

在俄罗斯诗歌的历史上，上自“文学之父”普希金，下迄“白银时代”诸诗人，彼得堡以其美丽的风光和厚重的历史一直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以至于被看作俄罗斯诗歌的象征。1916年冬天，茨维塔耶娃有过一次彼得堡之行。这次旅行成了她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彼得堡作为诗歌之母，仿佛以阴柔的力量孕育了她在诗歌中歌颂“阳刚的”莫斯科的意识。她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莫斯科诗人的价值，决心要像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热爱彼得堡似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斯科。为此，她写下了组诗《莫斯科》，莫斯科有她熟悉的博物馆、熟悉的音乐厅、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小树林、熟悉的广场与教堂，而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肋骨承受着一切”，那是她的诗歌之根，也是她介入生活的出发点：

“从我的手中接受非人工的界限，
我奇怪的兄弟，出色的兄弟。

在被彼得抛弃的城市上空，
雷鸣般的钟声在滚动。

整个一千六百座教堂
都在嘲笑沙皇们的傲慢！”

而她对彼得堡诗人的敬仰则催生了组诗《致勃洛克》和《致阿赫玛托娃》，以及献给曼杰什坦姆的一系列诗歌。在《致勃洛克》中，她以充满激情的语调向抒情对象倾诉道：

“你的名字是手中的小鸟，
你的名字是舌尖上的冰块。

你的名字是眼睛上的吻，
亲吻那合拢的眼帘温柔的寒意，
你的名字是一口幽蓝、冰结的泉眼。”

诗人甚至觉得，怀揣着“你的名字”进入梦乡，是一件最为甜蜜的事情。这里，勃洛克已经不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诗人，而是被赋予了“温柔的幻影”、“无可挑剔的骑士”和“雪白的天鹅”等形象，成为一种诗歌的理想和象征，写作的标尺。她期盼自己的“手”能与勃洛克的“手”相握，就像“莫斯科河”与“涅瓦河”一般相汇合，尽管他觉得，那如同“朝霞”对“晚霞”的追赶，其中不难看出后来者潜伏于谦卑中的骄傲。

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心目中，是“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是“金嘴唇的安娜”（希腊神话中雅典娜式的智慧女性），她的名字就像“一个巨大的叹息”，他为此要献给阿赫玛托娃“比爱情更永恒”的礼物，亦即诗人自己的心灵，然后，像一名两手空空的乞丐似地离开。不过，与对勃洛克的崇拜不同的是，茨维塔耶娃向阿赫玛托娃投去的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敬意，她们之所以能成为“星星”、“月亮”和“天堂的十字架”，是因为都是“大地的女人”。

3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茨维塔耶娃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加诸其身的困厄。1917年，丈夫艾伏隆应征入伍，一去便杳无音讯。1919年秋，走投无靠的茨维塔耶娃不得不将两个女儿送进了库恩采夫育婴院。不久，重病的大女儿阿利娅被送回了家，可是，小女儿伊利娜却不幸饿死在育婴院中。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她仍然没有中断自己的诗歌写作，或许，此时的写作已经成了她排遣孤独与贫困最重要的手段。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1921年所出版的诗集《里

程标》。在这部诗集中，她集中地描写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不过，这些诗歌与少女时代的作品相比，更多地是掺合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着对未卜的前途的忧虑，以及灵魂深处冲撞不已的渴望、追求、欲望、困惑和矛盾：

“我的灵魂和你的灵魂是那样亲近，
仿佛一人身上的左手和右手。

我们闭上眼睛，陶醉和温存，
仿佛是鸟儿的左翼与右翅。

可一旦刮起风暴——无底深渊
便横亘在左右两翼之间。”

1922年，艾伏隆随着溃败的弗兰克尔军队流亡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因对白军的行为感到失望，脱下军装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在得知丈夫犹在人世的消息后，茨维塔耶娃被获准出国团聚。出国之初，她来到了德国的柏林。当时的柏林是俄罗斯侨民文化的中心之一。她在那里见到了叶赛宁、安·别雷和鲍·帕斯捷尔纳克，后者新近出版的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妹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柏林时期是茨维塔耶娃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她出版了《别离》、《天鹅营》、《手艺》等诗集。此外，还创作了几部叙事诗，如《山之歌》、《终结之歌》、《空气之歌》、《捕鼠者》等。

无疑，在俄罗斯诗歌史上，茨维塔耶娃属于天才诗人那一类型，综观她的整个创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充溢的灵感和丰富的想像力，其中没有丝毫的匠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忽视过诗歌的技术层面，恰恰相反，她比很多平庸的诗人都更重视技术的存在。她深深地懂得，没有手艺，人们就不可能化平淡为神奇，不可能在尘世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因为，“上帝与构思同在！上帝与虚构同在！”所以，她自豪地宣称：

“去为自己寻找一名可靠的女友，
那并非依仗数量称奇的女友。
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
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

对手艺的重视使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上述特点以及那些不完整的句式，往往在词与词、句和句之间造成很大的跳跃性，使得她的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晦涩难懂。但是，读者倘若能够剥开隐晦的语义外壳，细细品味一下其中含纳的深意，便不难顺着技术的线索走向精神的深宫，从而感悟这位命运多舛的女诗人对生命本质所作的特殊诠释，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同情和共鸣。



无疑，在俄罗斯诗歌史上，茨维塔耶娃属于天才诗人那一类型，综观她的整个创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充溢的灵感和丰富的想像力，其中没有丝毫的匠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忽视过诗歌的技术层面，恰恰相反，她比很多平庸的诗人都更重视技术的存在。

1925年秋天，茨维塔耶娃夫妇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莫尔迁居到巴黎。白俄侨民界在表示了最初的欢迎以后，便觉得她的诗歌“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认为是“非我族类”而开始对她予以排斥和打击。不久，由于茨维塔耶娃流露了某种亲苏倾向，对马雅可夫斯基表示出好感以后，她的处境更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我

在这里是多余的，而回到那里又不可能。”这一时期，孤独、贫穷、对祖国的怀念，成了她创作中最主要的主题，它们集中体现在1928年出版的诗集《俄罗斯之后》中。

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推荐和介绍，茨维塔耶娃于1926年春天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取得了通信联系。于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并构成了一段奇异的三角恋爱。这种由通信而建筑起的恋情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一段著名的佳话，他们停留在纸片上的亲吻和拥抱，字里行间那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再一次为人类由情欲向精神皈依，为生命超越死亡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茨维塔耶娃的这种激情在其后所写的、献给里尔克的一篇散文中

诗人输出了他的血，之后便死去了。上述便是茨维塔耶娃通过《你的死》一文告诉我们的死之“净重”。

三十年代是茨维塔耶娃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形成这一高峰最直接的原因是，诗歌不可能像其他体裁那样在侨民文化界“畅销”，它先天的贵族气息使其只能服务于少数的知识精英，而散文的“流通性”则可以顺利地“大众化”，进而“化大众”，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收获。正如诗人略带自嘲地说道：“侨居使我成了一名散文作家。”另外，对一个诗人而言，在高强度的诗歌写作之后，能有一个匀速的“散文”阶段，也不失为“百米冲刺”后的“缓冲”，可以在休养生息中得到能量“再集聚”的机会。需

这种由通信而建筑起的恋情
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一段著名
的佳话，他们停留在纸片
上的亲吻和拥抱，字里行间
那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再一
次为人类由情欲向精神皈
依，为生命超越死亡树立了一个
光辉的典范。



积淀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理性。在这篇文章中，茨维塔耶娃开篇便说道：“每一个人的死，都必定融入到别人之死的行列，都必定在死亡之列中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先逝者由于后逝者的存在，形成了一个活的长链。诗人以对死亡思考，触及了生命的隐秘联系，把人们送回到了生的境界。“莱纳，我被你的死亡吞噬了，也就是说，我把迄今为止我所忍受的一切亲人的死都与你的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母亲那高傲的死，还是父亲那异常令人感动的死，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死”。我们不难发现，充盈在这段文字中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这种爱来源于诗人的使命感：世界病了，它需要输血，而与拥有同一血缘的是我们的诗人，

要指出的是，这些散文并非随意之作，其中的一些名篇，如《劳动英雄》、《一首献诗的经过》、《记忆之井》（直译为《关于生者的生动印象》）、《诗人与时代》、《被俘的灵魂》、《诗人论批评家》、《普希金和普加乔夫》等，记述了关于勃柳索夫、曼杰什坦姆、沃洛申、别雷等“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的印象，它们以随笔的形式阐述了她对生活的思考，对艺术和诗歌的一些深思熟虑，尽管叙述的是他们，表达的却是诗人自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诗歌的血液在散文的脉管里的流动。

在茨维塔耶娃众多的散文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自传。它们由十六篇回忆文章组成，包括《母亲与音乐》、《我的普希金》、《老皮门的房子》、



《未婚夫》、《中国人》，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你的死》等。在《我的普希金》中，诗人描述了她走进普希金的心路历程，以一个现代诗人的激情向本民族的经典诗人表示了由衷的敬意。童年时代，她便形成了一个纯粹诗人性质的印象：丹特士之所以会和普希金决斗，并将后者杀死，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丹特士不会写诗。从此，她在幼小的心灵里，便将世界划分为诗人和大众两大类，她本人则倾向于诗人一边，把诗人作为保护的对象。而在对普希金的解读中，茨维塔耶娃也显露了一个诗人的敏锐，她以独特的慧眼指出，普希金一生最爱的女人是他的奶妈，那个不像女人的女人。他对奶妈说过的话是人世最温柔的语言，他不曾把这样语言呈献给任何别的女人。与普希金一样，茨维塔耶娃从事写作时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自由”。因此，在阐述前辈诗人的名诗《致大海》时，她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自由的自然力”并不是大海，而是诗本身，那是人们永远无法舍弃的诗。

像许多俄罗斯侨民一样，侨居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始终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与此同时，白

俄侨民界的狭隘和虚伪更令诗人感到不屑与之为伍。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携带儿子返回苏联。可是，等待着茨维塔耶娃的厄运是她始料不及的。同年8月，先期回国的女儿阿利娅被捕，随即被流放；10月，丈夫艾伏隆被控从事反苏活动而逮捕，后被枪决。这段时期，由于丧失了发表自己作品的可能，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到了诗歌翻译中。茨维塔耶娃的翻译十分严谨，她的翻译原则就是，一定要使笔下的文学作品获得它的文学性，否则，宁可不去发表。显然，她要以这样态度来换取口粮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因此，她不得不经常兼做一些粗活，如帮厨、打扫卫生等补贴家用。

在自传中，茨维塔耶娃陈述道：“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她的一行诗句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解：“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命运似乎也在为她的信念推波助澜。1941年8月，由于德国纳粹的铁蹄迫近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和惟一的亲人——儿子莫尔移居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小城叶拉堡市。正是在这座小城，诗人经历了一生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双重的危机。诗人茨维塔耶娃期望在即将开设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这一申请遭到了作协领导的拒绝。8月31日，绝望中的她自缢身亡。她给儿子留下的遗言是：“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

《茨维塔耶娃文集·小说戏剧》

《茨维塔耶娃文集·回忆录》

《茨维塔耶娃文集·诗歌》

《茨维塔耶娃文集·书信》

《茨维塔耶娃文集·散文随笔》

汪剑钊主编

刘文飞 万海松等译

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

对俄罗斯白银时代（1890年至20世纪20年代）的诗人，中国读者了解最多的，

大多是男性诗人，

不多的几个女诗人可能也就要算阿赫玛托娃（1889—1966）、茨维塔耶娃（1892—1941）和吉皮乌斯（1869—1945）了。实际上，在文学艺术极其繁荣的世纪之交，俄罗斯女诗人实在不止她们这几位。

据有的研究者考查，有生平可考的大约就有二百多位。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多部诗集出版，有自己的创作特色，并且不受流派和门户之囿，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炫目的亮点。

她们的诗歌创作在某些方面达到、甚至超越了男性诗人们所取得的成就，

她们所聚居的“帕尔纳斯山”完全可以与男性诗人的相媲美。

在女诗人的“帕尔纳斯山”

■ 万海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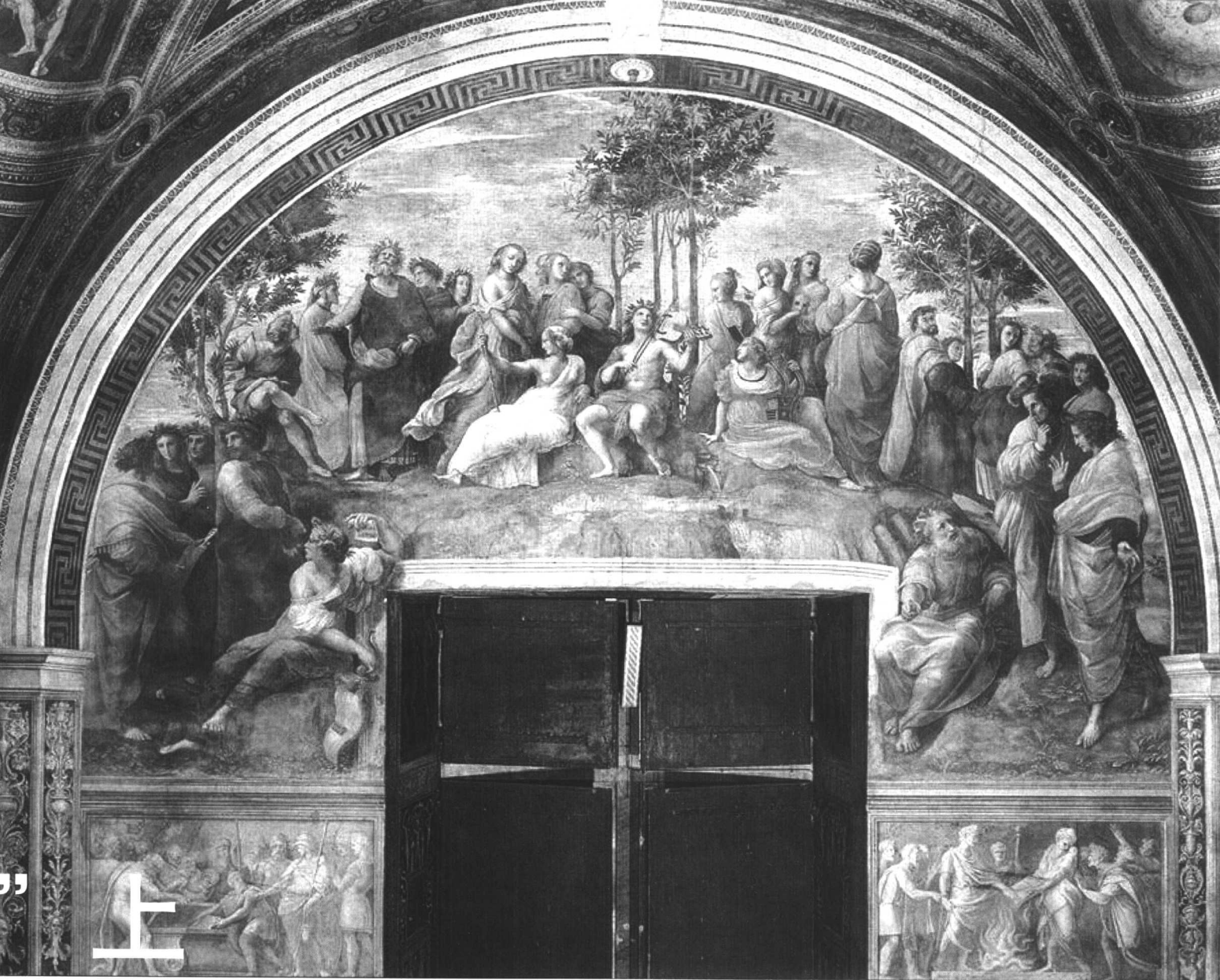
女性诗歌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改革呼声越来越大的俄罗斯，“世纪末”情绪蔓延着整个知识界，面对在各方面都未曾彻底革故鼎新的社会面貌，人们开始在文学中（特别用诗歌）表达自己内心深深的失望和失落感。在西方社会思潮的吹拂下，俄罗斯国内出现了相对限度的自由，人们有一定的权利去选择个人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手法。女性诗歌的崛起与繁荣，跟妇女争取在生活各个领域获得平等权的斗争的日益加强密切相关，无论是选举权还是接



阿赫玛托娃（1889—1966）

茨维塔耶娃（1892—1941）



受高等教育或自由恋爱的权利。

从那时起，俄罗斯开始有一些全新的妇女组织建立起来。妇女在这些组织中联合起来，主要不是为了从事手工劳动或进行上流社会的闲谈，而是为了共同参与妇女运动。一些团体，比如莫斯科的“妇女平等联盟”，彼得堡的“妇女进步党”开始出现。同时，大量的妇女杂志也涌现了出来，如《妇女世界》、《妇女》等。另外，出版社还出版《妇女百科全书》，以及各种选集和文集，如《妇女诗歌》

(1909)等。许多杂志开辟专栏，报道和讨论妇女问题。《当代妇女》杂志尤其关注“过渡时期妇女”的问题。它登载的大部分文章都在探讨这样一些问题：20世纪的妇女究竟应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自立？她们应不应该摆脱丈夫的束缚去“掌握方向盘以驾驶轮船”？女诗人柳博芙·斯托利察（1884—1934）在《新夏娃》一文中建议：在将来，妇女要像狩猎女神狄安娜一样穿托加（古罗马的一种装束），并且“在游戏的时候爱，而不是在爱的时候

游戏”。

当时的新闻界还定期通报关于妇女主题的学术辩论和报告，如《妇女的上帝与世界的恶》、《妇女在诗歌和生活中的面貌》、《女性心灵的巅峰与深渊》、《旧世界的女性主义与现当代的女性主义》等。包括瓦·勃留索夫、米·阿尔志跋绥夫、阿·托尔斯泰和费·索洛古勃在内的一些作家，都尝试着塑造

敢于违背传统道德常规，成为“堂璜和萨宁”（即文学中的花花公子形象）之流的妇女。然而，在她们看来，这些文学形象与实际生活中的女性不太相符，并没有触及占据“新夏娃”心灵的全部矛盾。因此，要求妇女不要再对自己的内心保持沉默，勇敢地道出真情实感的呼声越来越高。女诗人玛·莫拉夫斯卡娅（1890—？）在一次聚会上就此呼吁：“让妇女讲出自己的全部隐私，这对妇女很重要，这将给妇女带来解放。妇女通过自己的内心剖白诗从妇女变为人。”诸如此类的话在当时曾不绝于耳。于是，女诗人们的内心剖白诗就大量涌现，它们向读者敞露了女性秘密情感那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过程。

20世纪初，晚会与诗社十分盛行。男诗人的参与带动了女诗人的加入，以男诗人为主的晚会的兴盛带动了以女性为主的晚会的频繁举行。20年代时兴的“女诗人晚会”，主要由女诗人在晚会上朗诵诗歌。“斯卢切夫斯基家星期五晚会”、“尼基京家星期六晚会”、在女诗人马利维娜·马利亚诺娃（1896—1972）家举行的“文学星期四”晚会、在纳佩尔鲍姆家经常举办有新兴诗人参加的“文学星期一”晚会，以及在象征派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家“塔楼”里举办的“星期三”晚会，几乎排满了一星期的每一个晚上。参与这些晚会的，有很多热爱诗歌的女性，她们也积极加入一些由著名男诗人组建的诗歌社团。

谢尔盖·格罗捷茨基等人组建的第二批“诗人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精英女性写诗的时代，而并非女性皆诗的时代。女诗人们的职业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化工作，如教师、编辑、艺术家之类。她们的身份也不难确定，大多出身显赫，不是书香世家，就是政要之后。

行会”，吸收了很多女诗人。该会除辅导女性写诗，举行诗歌朗诵活动之外，还成立有“鸣响的贝壳”小组，不定期出版诗歌丛刊《鸣响的贝壳》。尼古拉·古米廖夫在彼得堡艺术宫举办的“诗社”，在当时影响也同样巨大。它也出版诗歌丛刊《艺术宫》。很多在白银时代诗坛崭露头角的女诗人，都是在这两份丛刊上发表处女作的。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精英女性写诗的时代，而并非女性皆诗的时代。女诗人们的职业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化工作，如教师、编辑、艺术家之类。她们的身份也不难确定，大多出身显赫，不是书香世家，就是政要之后。

在女性诗歌崛起的大潮中涌现出了几对姊妹诗人。泰菲（即娜杰日塔·洛赫维茨卡娅，1872—1952）和米拉（玛丽娅）·洛赫维茨卡娅（1869—1905）就是亲姊妹。伊达·纳佩尔鲍姆（1900—1992）和弗雷德里卡·纳佩尔鲍姆（1901—1958）姐妹的名气要远在洛赫维茨卡娅姐妹之下，但她们的创作特色鲜明，尤其是伊达，捕捉细节准确而独到，善用透视法来描绘寻常的事物。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和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1894—1993）姐妹也算是一对姊妹诗人。后者诗歌作品虽然不多，只在1916年时出版过一部诗集《烟，烟，还是烟》，但也算在诗歌史上留下了痕迹。两姐妹小时候经常在诗歌晚会上露面，一起朗诵诗歌，有时候缺了对方谁都不肯出席晚会。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曾在其短篇小说《在港口》中，以漫画的形式描绘了茨维塔耶娃姊妹的朗诵情景，并给她们起名“诺吉娅”和“多吉娅”（意为形影不离者）。

情人——缪斯

如果说，俄罗斯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久（如女

诗人索菲娅·杜布诺娃活了101岁[1885—1986]),因而出现了俄罗斯文学中的“遗孀现象”(如: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的妻子伊·奥多耶夫采娃[1901—1990]等)的话,那么在白银时代的“帕尔纳斯山”也有一支浩浩荡荡的“情妇大军”,她们的规模(就已经公开的而言)要远远大于那些屈指可数的珍贵的遗孀。

世纪之交男性诗人的创作以其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对独特手法的探索等特色,使人耳目一新。再加上他们那标新立异的举止和明显的宗派倾向,他们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不愿意局限于自己那狭窄的心灵世界的文化女性。另外,随着上流社会的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她们整体上对诗歌的感悟能力也逐渐提高。于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她们与已婚男性诗人心心相吸,以至于灵与肉的结合就不可避免。

象征派的领袖之一勃留索夫的
情妇就不乏其数。阿杰琳娜·阿达莉斯(1900—1969)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合写过诗作。1921年,阿达莉斯成为在勃留索夫发起下创立的“第一所国家专业诗歌学校”的校长。勃留索夫生前对她影响较深,在他死后仍不曾稍减。阿达莉斯在给玛丽娅·什卡普斯卡娅(1891—1952)的信中说,她曾对着勃留索夫的尸体朗诵起他的诗歌来,因为她深信,死者在死后40天内还没有丧失听觉。与勃留索夫的爱激发了她的诗情,她有些诗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譬如长诗《日子》,诗律严格,引经据典,刻画了一种“隐秘的快乐”。曼德尔施塔姆曾赞扬说,她的“声音有时具有男性的力量,并接近了真理”。

另一位女诗人娜杰日塔·利沃娃(1891—1913)则年纪轻轻就开枪自杀,为勃留索夫殉情。她曾在《俄罗斯思想》、《妇女事业》和《新生活报》等期刊编辑部工作。她的诗素以“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般的率真著称,情感敏锐,感受深刻。组诗《色粉画》记述了她为情所困后的猜疑、嫉妒和向往。阿赫玛托娃曾经就她的诗集《古老的传说》评论过她的诗才:“她的诗歌,技巧如此平平,但却如此感人肺腑,当它们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很亲切时,还没有达到那种明晰透彻的程度,但是,你只要相信了这些诗,就如同相信是一个人在哭泣着。”

虽然如此,勃留索夫并没有放弃四处播撒情种的想法,他甚至和别雷为一个诗才平平的女人尼娜·彼得罗夫斯卡娅(1880—1928)而争风吃醋、竭尽嘲弄。

女诗人瓦莲京娜·谢戈廖娃(1878—1931)的丈夫虽贵为教授、名流,她却公然与勃洛克在情感上缠绵,这种婚外情却使她诗情大发。她创作甚丰,却很少公之于众。她的诗作在语言和节奏上都表达出勃洛克所带来的一种“甜蜜的痛苦”。勃洛克有组诗《瓦·谢的

三封信》献给她:“瓦莲京娜,星辰,梦想! / 宛如你的夜莺在歌唱。”

阿克梅派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情人玛丽娅·廖夫贝格(1894—1933)曾参加过第二批“诗人行会”,古米廖夫的诗作《你是飞翔在高山上的云雀》就是献给她的,他还在《阿波罗》杂志上赞扬她的诗歌“活力十足”,具有“真切的诗歌体验”。

米拉·洛赫维茨卡娅和康·巴尔蒙特的亲密关系已是众所周知,后者把自己最好的一部诗集《我们会像太阳一样》(1903)献给了她。

可以说,情妇诗人占据了白银时代女诗人的“帕尔纳斯山”的许多重要山头,迄今为止,鲜有后辈女诗人在创作成就上超越她们。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之风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用阿尼玛(anima)来形

**可以说,情妇诗人占据了
白银时代女诗人的“帕尔
纳斯山”的许多重要山头,
迄今为止,鲜有后辈女诗
人在创作成就上超越她们。**

容男性的女性化特征,用阿尼姆斯(animus)来形容女性的男性化特征。世纪之交诗歌事业的发达与繁荣,为诗人们刻意表现异性诗歌特色这种戏拟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勃留索夫和娜·利沃娃就炮制过徒有虚名的女诗人“涅莉”。马·沃洛申和女诗人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1887—1928)虚构了异域女郎“切鲁宾娜·德·加布里亚克”,曾在诗坛闹得沸沸扬扬。爱德华·巴格里茨基曾以“尼娜·沃斯克列先斯卡娅”之名发表过诗作。尼库林曾托名“安热莉卡·萨菲扬诺娃”发表诗作,还出版过《安热莉卡·萨菲扬诺娃的身世与诗作》一书。

另外,还有一些代表男性力量的诗人,包括谢·戈罗捷茨基、瓦·舍尔舍涅维奇、阿·吉泽季等人,都曾创作过具有女性诗歌特点的诗作。

与此相类似的是,有些女诗人喜欢在诗作中将自己伪装成男性。阿尼姆斯之风虽不能说在女诗人中盛行,但好多女诗人都有故意为之的创作倾向。如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她不但有笔名“安东·克莱尼”(直译过来就是“极端的安东”,“安东”是男人名),还在诗歌中表现对自强与自立(乃至自高自大)的渴望:“我像爱上帝那样爱自己。”

马·沃洛申在发表于1910年12月11日的《俄罗斯晨报》上的《女性诗歌》一文中说:“吉皮乌斯和波利克谢娜·索洛维约娃似乎都隐藏了自己的女性气质,她们更喜欢在诗歌中穿着男性服装,把自己描写成男性。”

柳博芙·斯托利察的长诗《叶莲娜·杰耶娃》模仿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一个熟知大城市一切诱惑,对生活和爱情失望的女性奥涅金的形象,她像女骠骑兵一样,换上男装,跨马奔赴德国前线作战。她那不甚高明的模仿和明显的要与男权主义对抗的女性主义意图,引起了批评家的不满。诗人季尼亚科夫的话说得虽苛刻却中肯:“吉

皮乌斯是永恒的女士,阿赫玛托娃是永恒的女人,而斯托利察则是永恒的婆娘。”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较多表现出男性刚强的一面,这或许跟她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女人的执着和倔犟在组诗《生活》中表露无遗:“你是猎人,可我决不顺从,/你一路追赶,可我偏要跑。”

跟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一样,茨维塔耶娃和索菲娅·帕尔诺克(1885—1933)不但具有比较出众的诗才,而且还有同性恋行为。帕尔诺克在俄罗斯诗坛决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女诗人,她的成就虽然不及茨维塔耶娃,但还在许多人之上。茨维塔耶

娃在1921年给米·库兹明的一封信中,比较直率地说出了她和帕尔诺克的爱恋。茨维塔耶娃在《生动的记忆》这篇随笔里,还提到了她和阿杰莱达·格尔齐克(1874—1925)的情谊:“她在我的一生中跟马克斯(即象征派诗人马·沃洛申)一样重要,而我在她的一生中或许要比我在马克斯的一生中更加重要。”

情妇诗人占据了白银时代 女诗人的“帕尔纳斯山”的 许多重要山头,迄今为止, 鲜有后辈女诗人在创作成 就上超越她们。

无限风光

关于女诗人及其创作,歌德曾经说过:“我们的女诗人们尽可以一直写下去,她们爱写多少诗就写多少诗,不过只希望我们男人们不要写得像女人写的一模一样!”他的话很尖刻,但细细琢磨,并无道理。我们对白银时代女诗人创作的总体成就的把握,也有这种感受。少数女诗人的生平和作品没有进入我们的视界,除了雷同和无新意之外,还在于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女诗人作品比较少,死后作品散佚的也不计其数。

纯粹以女性为主题,深入描绘她们的面貌与内心,这本身就是女诗人创作的独特资源。比如,索·杜布诺娃的诗作的主题就是女性心灵,惟一的主人

公就是女人，如少女、爱人、母亲等。她有代表性的组诗之一就是《女性的面貌》，其他的标题也是关于女性，如《白衣少女》、《少女》、《处女》、《两姐妹》等。这种题材，一弄不好，就会变成对庸碌女性的简单生活的歌颂。塔季扬娜·叶菲缅科（1888—1918）的诗集《饥渴的心灵》就对家园、基督教日常事务、简单的爱进行热情讴歌，该诗集里的诗作类似于田园诗，渗透着泛神论世界观，它们的出现改变了20世纪文学中都市女性的一贯面貌。女性诗坛还有些极端者，甚至不顾传统和世俗的眼光，率直和坦诚地表现情欲等肉体感官方面的激情。伊丽莎白·斯图尔斯卡娅的诗集《浑浊的葡萄酒》以及其他许多诗作，惟一的主题就是与男人在肉体上的接触。诗歌仅仅表现这种主题，那就丧失了对世纪初的诗歌而言较典型的神秘性和审美性。玛·什卡普斯卡娅的诗歌的主题，就是女人在妊娠、生产、胎儿夭亡期间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感受。这种创作倾向不甚体面，所以，有些批评家就把她称作“有妇科学癖好”的女诗人。

宗教探索与哲理思考并不是男诗人们的专利。像阿·格尔齐克的所有创作都与宗教哲学探索密不可分，她的诗作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神秘主题，她竭力倾听自然的秘密，传达自然中被掩盖的声音。这种做法对世纪初的俄罗斯知识界来说是比较典型的。波利克谢娜·索洛维约娃（1867—1924）的有些诗作探索生与死的奥秘，比如，她的《我们活着，我们会死》一诗。有些表现出厌弃此世、追求彼岸世界的情绪。《篝火冰冷》中的“死亡如同朝霞升起”一句，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她对死亡和自由的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遍渴求革新的诗坛，回归传统的女诗人并不少。阿·格尔齐克就经常利用民间体裁，再现民间的哭诉歌和民间音乐。对祖国的深情，是白银时代大多数女诗人表现的主题。很多诗作对细节的把握十分动人，忧郁的抒

情分量较重：时时爱恋，刻刻思念。比如瓦尔瓦拉·沃尔特曼的爱国诗：“我曾爱过许多国家，/但还没有一个/比我们俄罗斯的野草更亲切，/比我们草原上的簌簌声更可爱。”正因为爱之深，所以有时就有恨之切的诗作。像马拉·伊万先科的“反爱国”诗就弥足珍贵：“我已不再爱那草原和山坡，/我也失去了我那令人痛苦的祖国，/不再爱那些圣事，对西徐亚人旧习的怀念，/朝着拜金的伪君子吹拂。/俄罗斯女人那轻柔的动作，/松垮垮的发辫那酸涩的芳香，/还有那唱响圣歌的，/如晚秋落叶时节的心灵阁楼。/我已不爱。”这种“不爱”，其实是一种“甜蜜的恨”，因为失去祖国后思念她而不得，故生恨意。这种“反爱国”诗是爱国诗的另一种新颖而独到的写法。

不可否认，在白银时代，女性诗人的创作受男性名诗人的影响甚重。对她们而言，她们的成就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负担。

不可否认，在白银时代，女性诗人的创作受男性名诗人的影响甚重。对她们而言，她们的成就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负担。谢戈廖娃的诗歌就体现出对普希金的幼稚的模仿和勃洛克的明显的影响。但同时，男性诗人也开始重视女诗

人的创作。自我未来派诗人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就把米拉·洛赫维茨卡娅当作自己的导师。再者，女诗人对女诗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叶莲娜·古罗（1877—1913）对阿达·弗拉基米罗娃（1890—1985），阿赫玛托娃对几乎所有女诗人都有影响。

俄罗斯白银时代女诗人的“帕尔纳斯山”瑰丽异常，风光无限。文采飞扬的女诗人们为我们留下无数杰出的诗篇，然而，遗憾的是，我国读者对她们知之甚少，而本文也仅仅是对她们的生平和创作的惊鸿一瞥，对她们的考查和研究还亟待深入。为了让我国读者全面地了解她们，首要的工作是对她们的创作进行译介。这是摆在俄罗斯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相关书目：

- 《白银时代101位女诗人》
库什琳娜、尼科利斯卡娅编选
圣彼得堡：“德尔恩”出版社
2000年
- 《俄罗斯未来派诗歌》
阿尔方索夫编选
圣彼得堡：“学术计划”人文出版社
1999年
- 《20世纪俄罗斯诗歌·前25年俄罗斯抒情诗集》
叶若夫、沙穆林编选
莫斯科：“阿米鲁斯”出版社
1991年
- 《1918—1941诗选》
谢维里亚宁 著
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
1990年
- 《那些日落的日子：茨维塔耶娃和帕尔诺克》
波利亚科娃著
（美国）安阿伯：阿狄斯出版社
1983年
-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
顾蕴璞编选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年
- 《阿·阿赫玛托娃传》
[俄]阿·帕甫洛夫斯基著
守魁、辛冰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理解茨维塔耶娃

■ 树 才

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宣称，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先不管这个“最”字是不是用得贴切——“最”字用在艺术上总是不贴切的。对艺术而言，只有变化，只有独特，没有“最”好——但从作为修辞手段的这个最高级中，我们却可以“最”真切地感受到，布罗茨基对茨维塔耶娃怀有一种多么刻骨铭心的偏爱！这种偏爱源自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漫漫无边的感同身受——理解，爱！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正是让人产生这种偏爱的诗人！对茨维塔耶娃这个人，对茨维塔耶娃这个人写下的这些诗，我们只可能有一种选择：或者热爱，或者根本就无法理解。何谓理解？理解就是给予一点点爱。茨维塔耶娃是为爱来到这个世上的。她用一生的心血和力量去爱（不，应该说奉献！）。心灵是她爱的器官，颤栗是她爱的姿态，诗歌是她爱的形式。在对爱的无私奉献中，茨维塔耶娃经历了坎坷的一生，但也是轰然作响的一生。这样的一生太崇高，太奇迹，太不能为平庸而强大的世俗所容，于是她只好选择——自杀。自杀这种极端的死法，在我看来，始终是过于眩目的行为。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一个诗人会因疯狂而自杀。恰恰相反，我深信诗人的自杀是出于最深邃的理智。那些因疯狂的激情而疯狂了的诗人，其实都活了下来——世俗社会从来都是容忍疯子的（疯子对人们的理解力构不成挑战）。但那些深深地疯狂着却还要行走在人群中的诗人，他们的命运才是真正悲惨的。

茨维塔耶娃自杀之前说：“我已陷入了绝境”，“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会这样！爱的狂热，美的狂热，获得存在意义的狂热，焚烧了茨维塔耶娃一辈子。说到底，是她火热个性中“无法生存我就宁肯死”的基因，把她指给了悲壮而暗哑的生命最后一招。在诗人那里，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气质，血性，属于遗传的秘密。但诗人的大部分才华，比如语言，深度，仍是后天长期积累所得。至于敏感，只要是诗人就没有不敏感的，而且最可贵的应是内心的敏感。尽管茨维塔耶娃被认为是天才诗人，但她作为诗人的生成，仍然有着清晰的脉络。

成为一名诗人？在青春时代，多少年轻人曾萌生过这一浪漫而伟大的愿望！但命中注定，只有不幸中的不幸者（也是幸运中的幸运者），才能最终承担起这一命运。诗人何为？诗人写

诗。但别忘了，写诗是伴随着生存并在生存中展开的，这就意味着，诗歌同时还是一种人生，一种命运。写诗这一行为只是把这种人生语言地落到实处。汗毛孔一样多的生存细节仍需日常地穿越。

她的诗作，没有一首不是源自她的生存遭际。在她身上，诗歌声音和诗人声音的奇异重合，像心灵之嘴和身体之嘴的二重唱，使她的歌声久久地回荡在天地之间。这是最强烈的心灵状态和最简略的语言创造的完美结合。而这种结合所抵达的，就不只是语言创造的高度，而更是灵魂直接喊出自己的高度。读懂茨维塔耶娃诗歌的人，顾不上去细究这句或那句诗的意象和用词（它们当然是精妙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强悍的震撼力！），因为这些诗句里活蹦乱跳着那么率直、那么深沉、那么忘我的一颗内心。

在整个“白银时代”诗人群的非凡合唱中，茨维塔耶娃的歌喉显得格外粗犷，激烈，大开大合，显得更加悲剧，高亢，不加压抑。要说诗艺，这才配叫诗艺。这诗艺直接命中，毫无罗嗦：让能够说出的直接找到最简明的语言形式，让无法说出的谦卑地隐身于“破折号”的桥下。她是用大粗黑笔写诗的，而不是用细铅笔或圆珠笔。

对“白银时代”诗人群，最得我心的是曼德尔施塔姆，但最让我暗中惊叹的，还是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类似于奇迹，有那么一个，整个时代的黑暗就被照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样的诗人本身就是人性之光，就是痛苦深渊。当然，在痛苦深渊的挣扎注定是无望的，只是，生命在挣扎中也烙下了不灭的血印。当这些血印在语言的允诺下，进入天空般无所不在的隐喻空间时，诗最终在神性层面得以超越自身，并像古老的箴言一样代代相传。

《茨维塔耶娃文集》（共五册）的面世，对我们当下的汉语诗界，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我们伟大悠久的古典诗歌是讲求含蓄和意境之美的，常常止于山水的空灵之境和对纷繁人世的虚无认知，其实，中国诗人在淡泊中也不乏灰心，超逸时更常露破绽，而茨维塔耶娃身上那种自由独立的人格，那股忠于个性的勇气，尤其是，她心灵的浩瀚和血性的饱满，也许会给我们逐年趋于苍白、越来越迷恋技术之美的现代汉诗提供一种有力的参照。

血的殷红，爱，痛苦，心灵的非凡品质，总是诗所珍贵的。